

**全國人民團結起來，
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
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

人 民 出 版 社

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堅決、徹底、
乾淨、全部地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

•

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1851 • 787×1092 32 • $\frac{3}{4}$ 印張 • 16,000字

一九五五年七月第一次

一九五五年七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1—350,000 定價：(3)0.07元

目 錄

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 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	羅瑞卿 1
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進行鬥爭必須放手發動 羣衆	“人民日報”社論 17

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堅決、徹底、乾淨、 全部地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

(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在第一屆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的發言)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 羅 瑞 卿
第一辦公室主任兼公安部長

我完全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草案，完全同意李富春、李先念、彭德懷、鄧子恢四位副總理和彭真副委員長的報告。

我想說一說我們實現社會主義建設計劃的一個重要的保證——鎮壓反革命分子的活動。

當全國人民歡欣鼓舞地為創造我們未來的幸福而奮鬥的時候，反革命分子所進行的活動恰恰相反。他們千方百計地破壞人民的財產，破壞社會主義的建設，妄想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使我國仍舊退回到被壓迫的、落後的、窮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時代。因此，要容忍反革命分子的活動，就不能安全地進行社會主義的建設；要安全地進行社會主義的建設，就不能容忍反革命分子的活動。

我這樣說，是否誇大了事實？那末，讓我們從幾個實例來看看最近時期反革命分子是怎樣破壞着我們的建設吧。

一九五四年一月，安徽蕪湖紗廠被反革命分子縱火，燒燬二萬三千多紗錠，損失一百六十餘萬元。

一九五四年六月，瀋陽建築工程局第三分公司職員蔣匪特務田玉昆，放火燒掉工地材料倉庫的全部建築器材和三幢宿舍，並把救火的工地中共支部書記張殿龍同志打昏。

一九五四年十月，上海石油批發站反革命分子龔阿寶，利用國慶節值班的機會偷將該站二〇二號油池打開，使石油流入通黃浦江的河溝，企圖引起嚴重火災。幸虧河溝事前已被堵塞，未釀巨禍，但石油已被放走二千六百多斤。

一九五四年十月，廣州破獲了一個以蔣匪特務呂薄冰為首的三十一名反革命分子的陰謀集團，這批反革命匪徒準備了鐵鏈、鐵棒、石灰等兇器，計劃偽裝搭客，把民生輪船公司的民俗輪在航行途中劫往台灣。

一九五五年六月，陝西朝邑縣勝利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麥場被反革命分子縱火，登場的一百多畝麥子全被焚燬。

這些確鑿無疑的事實，說明反革命分子對於我們的基本建設、工業、商業、運輸業和農業，都在進行着瘋狂的破壞。

反革命分子有許多破壞是通過一定的技術來進行的。

一九五四年三月，太原重型機器廠唯一的五噸大型汽錘，剛剛安裝起來不久，就被反革命分子傅家邦故意藉試錘的名義加以破壞。這個氣錘可以鍛造十噸以上的鍛件，每天可以創造一萬元的財富。

一九五四年三月，丰沙鐵路二十號隧道發現頂部有巨大的空洞，工程師反革命分子董殿凱故意違反本人所熟知的施工規則，用廢木料填塞，外塗灰漿，掩飾隱患，陰謀使隧道在通車的時候受震崩毀，企圖造成難以預料的嚴重事故。

一九五四年七月，河北下花園煤礦第一礦，由於副礦長兼主管技術員三青團分子李德厚，故意採取錯誤的採掘辦法，使瓦斯大量積聚，發生爆炸，犧牲職員工入三十八人，中毒一百五十六

人，直接損失財產五十餘萬元。

一九五三年三月，某國防工廠助理工程師國民黨分子張韻私改圖紙，造成了廢品和返修品八千四百件，裝成的五百零九件武器試射時都不能準確發火。這不但是國家財產上的巨大損失，而且這種武器在戰場上不能殺傷敵人，反而可能殺傷自己。

我們全國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一切愛國的、善良的人們，爲了發展生產，建設祖國，每一天，每一月，每一年，是付出了多少勞動，克服了多少困難啊！但是這些反革命強盜只要出一個壞主意，轉眼之間就可以使多少寶貴的生命死亡，無數的財富化爲灰燼。請看反革命分子爲了破壞社會主義建設，兇惡毒辣到了怎樣的程度！

或者有人以爲反革命分子破壞社會主義建設，是因爲他們反對社會主義，反對社會主義的國家，他們對於普通人民也許並不反對嗎？事實證明這種想法是錯誤的。例如一九五四年夏天武漢的防洪鬥爭，這是關係所有居民的安全的，反革命分子可以不加破壞了吧？但是有個原蔣匪少校軍官七級技工李建勤，故意破壞修堤用的一噸推土機，使它七天不能推土。另一個國民黨員地主分子電訊局技工王傑英，在市內抽水的緊急時機故意燒毀變電所的變壓器，使六十部抽水機停車十八小時。這一類的破壞事故在六月下旬到八月下旬竟發生了一百多起，其他放信號彈、製造謠言、煽動民工逃跑、乘機搗亂市場、在製造防汛器材中摻假騙錢等事件還不在內。

這些事實說明甚麼呢？這些事實說明，反革命分子在人民中間是絕對孤立的，他們同任何普通人都沒有共同的利益。他們仇恨人民，仇恨人類，仇恨社會。“我幾乎恨一切人”，胡風分子的這句話，代表了一切反革命分子的心理狀態。

反革命分子雖然是一些亡命的強盜，但是他們是受着帝國

主義和蔣介石匪幫鼓勵和指使的，因此他們的活動還不限於破壞建設。他們還在妄想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反革命的復辟。

反革命分子爲了進行顛覆活動，竭力收買一些社會的敗類參加他們的組織，並且用各種不同的名目來欺騙一些落後分子作他們的工具。據一九五四年河南、廣東、湖南、江西、安徽、江蘇、貴州、雲南八省和上海市的不完全統計，共破獲反革命集團案件八十三起，其中二十七起即有反革命分子一千零七十四名。香港蔣匪特務機關所謂“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組”曾經給他們所派遣的一個特務分子許波平規定，發展到十五人，每月薪金港幣一百元；發展到二十五人，每月二百元。這個匪徒在半年內果然發展了十九個特務。我們大家都知道，胡風反革命集團也就是按這種“爭取人、聯絡人”的方針發展起來的。

資產階級中的不法分子爲了抵抗社會主義改造而結成的一些秘密團體，在最近兩年內比在“五反”時期是增加了，其中有些竟直接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例如一九五四年七月，上海祥泰鋸木廠的老板周長明，竟糾合黨羽，組織所謂“各界人民反共總會”，印發反革命傳單。

潛伏在宗教團體內的反革命分子，披着宗教活動的外衣，也在進行着發展反革命秘密組織的陰謀。一九五三年五月和一九五四年三月，河北獻縣地區和永年地區破獲了兩起利用天主教名義進行叛亂活動的秘密組織，僅地洞、暗室、夾壁牆就查出了一百幾十處，最大的地洞可容一百多人。

反動會道門也是反革命分子發展組織的一種重要方式。一九五五年一月，陝西省破獲了一個“一貫道”化身的“中道”，僅反動道首就捕獲了四百三十四名，挖出各式地洞、暗室一百零二處，繳獲大批槍支、子彈、蔣匪黨旗和其他反革命罪証。

反革命分子的顛覆活動的重要內容之一是把我國許多機密情報偷送給敵人。

例如：天津五達貿易行監理李芳五，在一九五四年七月親去香港接受特務機關的訓練和任務，負責給敵人調查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番号、裝備、調動，重工業廠礦的分佈，通訊器材的管制狀況等等；他不但利用自己的企業在天津成立“交通站”，而且还計劃吸收他的哥哥和朋友在蘭州和瀋陽成立“交通分站”。

上海東華國製梅廠經理徐孟奎，一九五一年去香港加入特務組織，同年回上海後，在一年多的時間內，即向香港特務機關用密寫方法報告軍事和政治情報十餘次，軍事情報包括海軍船艦停泊情況等。

蔣匪特務王砥中在一九五三年潛入廣東，騙取了廣東省建築工程局設計公司技術員的職務，在半年中間給香港蔣匪特務機關送去了軍事、政治、工程等情報二十多件，在工程情報中包括廣州新建船塢的詳細情報；此外，他還搜集了關於武漢造船廠、長江大橋等八項情報準備送出。

美國中央情報局派遣的特務黎英，在一九五四年三月潛入廣州，也在半年中間給香港美國特務機關送去了有關廣州駐軍、高射砲陣地、飛機場和粵漢鐵路運輸情況等情報二十多件。

反革命分子在某些農村中認為有機可乘的時候還企圖暴亂。

例如浙江東陽縣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反革命分子糾合匪徒百餘人，自稱“剿共司令部”，分路攻打象崗鄉和宅口鄉的人民委員會，象崗鄉的正副鄉長都被綑綁砍傷，幸經縣公安部隊趕到救出。

美國“自由中國運動總部”和蔣匪“總統府資料組”聯合派遣的特務分子伍傑三在潛回安徽廬江家中後，就發展特務組織，搜

集武器，企圖利用一九五四年秋季水災的機會，到大別山建立所謂“游擊根據地”。

一九五四年在山東荷澤出了七個“皇帝”，一九五五年三月又在河北張家口專區出了一個；這也是敵人組織暴亂的一種形式。

反革命分子另一項突出的活動是兇殺和暗害。

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八日，瀋陽西郊大榆樹村蔬菜生產合作社財務委員李景雲全家八口，被三個反革命富農分子殺死。

一九五五年五月三日，甘肅玉門原國民黨區分部書記陳志榮，由於懷恨家人反對他的反革命活動並強令他勞動，竟在夜間殺死兩個弟弟、弟媳、姪兒、姪女，砍傷妻子，又跑到鄉人民委員會企圖殺死鄉長和中共支部書記。

混入河北石家莊專區第一人民醫院的反革命分子原國民黨區分部書記王丕昌等三人，在一九五二至一九五四年內故意製造多次醫療事故，造成殘廢二人，死亡十人，內有中共縣委書記一人。他們甚至得意忘形地對院內的共產黨員說：“你是共產黨，我是國民黨，你說怎办就怎办吧。”

但是反革命分子並不以殺害少數人爲滿足。一九五四年國慶節前夜，蔣匪保密局曾派它的行動處副處長姚愷如到香港，布置一個對廣州的大規模的爆炸。姚匪從一九五四年六月起，就個別地選擇、訓練和派遣了特務十二名，完全由姚匪個別地指揮，個別地分配任務和供給炸藥。這夥匪徒們所領到的爆破器材有美製烈性炸藥、燃燒藥、雷管等五十四盒。匪徒們計劃在一九五四年國慶節實行爆炸，目標有國慶節的紀念會場、遊行隊伍、戲院、茶樓、工廠、倉庫、油庫、車站、橋梁、兵營、飛機場、政府機關等。

反革命分子的罪惡是說不完的。但是我想，從剛才舉出的

这些例子，已經可以看出他們的猙獰的面目了。

各位代表！對於这批窮兇極惡、滅絕人性的反革命匪徒，我們在座的任何人还能够加以容忍嗎？任何善良的中國人，任何希望中國國家富強，社會進步，甚至只希望自己安居樂業的中國人，對於这批匪徒的滔天罪惡，还能够無動於衷嗎？任何人听了這樣駭人听闻的陰謀，还能够認為反革命分子不过是“幾條泥鰍掀不起大浪”，因而安慰自己嗎？

或者有人要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已經進行過大規模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和多次的社會改革運動，在這些運動中已經鎮壓了大批的反革命分子，爲甚麼目前還有這樣多反革命分子在活動呢？

毫無疑問，從鎮壓反革命運動和各種社會改革運動以後，反革命分子的活動已經受到了極大的打擊，人民民主專政已經得到了極大的鞏固。由於政府和人民羣衆的共同努力，反革命分子的陰謀活動，大部分在事前就受到了制止，一部分已經造成的破壞事件，一般地也能迅速破案。僅在一九五四年內，破獲的特務間諜案件即達六百一十九起。但是我們決不能因此而自滿。如上所說，反革命分子仍然造成了不少嚴重的破壞；而尤其重要的是，還有大批的反革命分子還在潛伏着，準備着製造更多的破壞。

當然，反革命分子在全國人口中只佔極少數，愈往後還要愈少。但是在我們這樣的六万万人口的大國裏，反革命分子究竟不止幾百個幾千個。大家知道，反革命分子的唯一前途就是滅亡；但是我們也不能設想他們會在短時間內完全消滅。這是因爲：

第一，我們要記着，只在六年以前，我國的大部分土地还是由反革命勢力統治着的，反革命多年的統治所留下的垃圾是不

可能一下子完全掃清的。

第二，我們也要記着，反革命統治在我國大陸上雖然被徹底推翻了，但是蔣介石匪幫还在美帝國主義的保護下盤據着台灣，帝國主義还在包圍着我們，我國內部的反革命分子还在受着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匪幫的支持。美國助理國務卿羅伯遜曾在一九五五年二月十日美國衆議院撥款委員會明目張胆地作証說：“我們所希望的解決中國大陸問題的办法……是用促成內部瓦解的行動。”在美國政府的每年預算內，就公開地規定着專用於顛覆社會主義陣營各國的一億美元的經費，其中並有五千萬美元政府可以秘密使用，而不向國會報告。美國在我國周圍設立了大批的間諜組織。很明顯，他們的方針不是白定的，他們的錢不是白花的，他們的組織不是白設的。至於蔣介石匪幫進行特務活動所用的力量，更是大家所知道的了。

第三，我們還要記着，我國正处在階級鬥爭劇烈的過渡時期。過去的未被鎮壓的反革命分子，或雖已判刑而已期滿釋放的反革命分子，在土地改革中受到打擊的地主階級分子，以及其他因為貪污、盜竊、傷害人命等各種罪行而受到正義的打擊的分子，有許多人並沒有就此安分守己，還在圖謀報復；而在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又有一部分資產階級分子和富農分子拒絕改造，圖謀反抗。

這樣，就使得鎮壓反革命的鬥爭成爲一個相當長時期的鬥爭。只要國內的階級還存在，國外的帝國主義還存在，鎮壓反革命的鬥爭也就必然要存在。

一九五一年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得到了偉大的成績，但是我們應該看到，那次運動的主要鋒芒是對着公開的反革命分子，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被發現和鎮壓的並不多，而敵人今天的主要活動方式却是暗藏的。由於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得

到了廣大人民羣衆的愛戴擁護，反革命分子在多數情形下不得不把自己偽裝起來，以便於保護自己，並且力求鑽到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政府機關和人民解放軍內部來進行破壞。前面所舉的一些反革命活動的事例，大部分都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所進行的。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偽裝進步作家，其中有不少人還鑽進了共產黨的組織，這是我們所已經知道的了。反革命分子甚至還鑽到黨的領導部門以至公安部門中來。上海市前副市長潘漢年長期間同敵人的特務機關相勾結。前上海市公安局長楊帆，在共產黨叛徒饒漱石和潘漢年共同指使下，背着中央，包庇、掩護和任用了大批的特務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使蔣匪特務機關的活動得到了護身符。各種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在過去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中還沒有受到充分的打擊，這是反革命活動在最近期間顯得囂張的一個重要原因。

反革命分子這樣囂張地活動，我們究竟應該採取甚麼辦法來對待呢？我們有兩條道路可以選擇。

一條是同他們妥協，實行和平共處。但是這一條他們不贊成，他們不肯跟我們和平共處。反革命分子的宗旨就是要消滅我們。有人說：應當對反革命分子寬大些，應當給他們出路。但是事實是相反的。我們對反革命分子歷來實行鎮壓和寬大相結合的政策，今後也仍然要實行這個政策，反革命分子是懂得這一點的。而那些堅決的反革命分子並不因為寬大而受到感動，反而常常利用我們的過分寬大來作惡。前面說過的三青團分子李德厚，在一九五〇年就因為瓦斯爆炸，被判处徒刑二年，緩期執行，在緩刑期滿後被提升為副礦長。這還不算寬人嗎？他還沒有出路嗎？他受了感動沒有呢？他的“感動”的表現，就是再一次製造傷亡一百九十四人的爆炸！又有人說：反革命分子所以活動，還是因為我們工作中有缺點。但是人民看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反革

命分子看我們工作中的缺點是完全兩樣的，人民認為我們對反革命分子鎮壓得不堅決是最大的缺點，反革命分子却認為我們不讓他們有反革命的自由是最大的缺點。玉門的反革命分子陳志榮把自己一家人都殺了，因為他家裏人不要他繼續反革命，這難道能說是他家裏人有缺點嗎？那批在廣州準備爆炸的特務並沒有人去惹他們，可是他們却企圖把廣州人大批地炸死；那批暗藏在武漢防洪組織內的特務也沒有人去惹他們，可是他們却企圖把武漢人大批地淹死。大家請看，同反革命分子還能有甚麼和平共處呢？如果宣傳同反革命分子和平共處，那究竟是對誰有利呢？

同反革命分子既然沒有妥協的可能，在我們面前就只剩下另一條道路，這就是全國人民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正確領導下團結起來，行動起來，為人民自己的安全和幸福，把一切反革命匪徒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加以肅清！

為了肅清反革命分子，首先需要提高警惕。反革命分子能夠暗藏下來，甚至暗藏到我們的政府機關、人民解放軍、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和各人民團體中間，能夠進行他們的各種危害活動，在很大的程度上都是由於我們的警惕性不高。在一九五一年鎮壓反革命運動以後，在許多人中間生長了一種極危險的麻痹自滿情緒，以為反革命分子已經鎮壓得差不多了，天下已經太平了，這種麻痹自滿情緒給敵人開了方便之門。機關用人制度不嚴，使壞分子容易鑽進來並保持他的職位。國家的機密、經濟上和技术上的要害保護得不好，讓敌人有接近的机会。对敌人可能的破壞缺少戒心，以至有時在敌人的破壞計劃已經露头的時候，還沒有發覺和採取必要的行動。公安部門在這個方面犯過許多錯誤。許多地方的公安機關對於反革命分子的猖狂活動沒有堅決鎮壓，引起羣衆抱怨說：“反革命想復辟，‘寬大無邊’是不

是也復辟了！”總之，許多同志缺少敵情觀念，忘記了敵人的存在，忘記了或者不相信敵人隨時隨地都在找我們的空子準備襲擊我們。因為這樣，這些同志就在實際上否認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這一條最基本的原理，否認了現實政治中革命和反革命不能妥協這一種最基本的事實，因而不但不犯嚴重的錯誤。

為了說明我們有些同志在政治上麻痹到甚麼程度，讓我在這裏介紹一段反革命政治流氓的活動史。

有一個國民黨員李萬銘，歷充蔣匪軍二〇七師文書、准尉政治幹事，陝西安康人，現年二十八歲。一九四九年五月南京解放，李萬銘偽稱中央大學學生，混入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軍政大學學習。同年十月畢業後，偽造印信，混入常州市政府建設科任科員。隨後又偽造印信到當時的蘇南行政公署撞騙，被判处徒刑三年。一九五一年一月假釋出獄。

這個騙子被釋放以後更猖狂了。他偽造了第二野戰軍的介紹信到陝西，冒稱是榮譽軍人轉業，居然被陝西省民政廳介紹給安康專署。這時他又偽造了黨籍的證明信，並且被專署機關支部信以為真，因而不但騙取了專署民政科科員的職位和殘廢軍人的証章，而且混進了共產黨內。一九五一年十月，李萬銘被派赴武功西北農學院學習，隨後不久，他又想出更大的騙局，捏造了一個“歷任紅軍連、營長和志願軍團參謀長”的履歷，和第二野戰軍軍政大學組織部要他“到中南局報到”的命令。這個荒唐的命令本來是容易識破的，但西北農學院黨總支委書記竟当真給他介紹到西北局轉中南局，而中南局組織部也竟分配他到中南農林部，使他擔任了中南農業科學研究所的秘書主任。以後又由於他的種種謊騙，升任中南農林部人事處副處長，黨總支委書記，並且同一個女共產黨員結了婚。

一九五三年九月，這個反革命騙子被調來中央林業部，林業

部擬任爲行政處長，他因爲“患病休養”，尚未到職。在十一月和十二月間，他僞造了一位高級將領給他的電報和“親筆信”，說是某司令員要他“回十二軍任參謀長兼三十五師師長”，並要他“火速乘飛機去蘭州商談軍務”。林業部的同志真熱心，毫不思索就給他買了飛機票，使他在一九五五年一月三日飛到了西安。他又找到原來的西北農學院黨總支委書記，还想再到那裏去鬼混兩個月，以便彌縫眼前的欺騙，製造下一步的欺騙。但是这一次这位黨總支委書記同志警覺起來了，他發現了他的馬脚，这才由陝西省公安廳加以逮捕。

李萬銘的騙術，說來是幼稚可笑的，但是他在一九四九年的半年中和一九五一年一月到一九五五年一月的四年中，跑過十幾個城市，闖過十幾個重要機關，竟然都一一蒙混過去了。這對我們是一個多麼辛辣的諷刺！我們的許多同志的警惕性究竟到哪裏去了呢？不是在睡覺嗎？有些人到現在還認爲我們的警惕性並不低，認爲現在我們大聲疾呼地要求提高警惕性是多事；那末，請問這樣的同志怎樣來解釋李萬銘事件的發生呢？這樣的同志難道不正是李萬銘等反革命分子所求之不得的嗎？

我們要知道，李萬銘事件決不是一件甚麼偶然的和孤立的“奇聞”，這是我們國家機關大批工作人員麻痺自滿的表現，正是這種麻痺自滿使許多反革命分子敢於爲非作歹，殺人放火，如入無人之境！我想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從這個事件得到教訓，而公安部門尤其應該得到教訓。我很希望我們中國也出一個果戈里，把李萬銘以及被李萬銘欺騙的麻痺分子搬到舞台上來，使公安工作者和全體人民都永遠記住這樣一件事，好比臥薪嘗膽一般。

提高警惕性的教育必須用具體的事實來進行。有人說：共產黨爲甚麼對胡風集團這樣大張旗鼓地宣傳呢？這不是小題大

做嗎？不是的！這不是小題大做，而是量体裁衣。胡風集團的揭露，正好用來教育人民，把人民的眼睛擦亮，因此，加以大張旗鼓地宣傳是完全合乎時宜的。我們必須時時刻刻用提高革命警惕性的任務來教育共產黨員、青年團員，教育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成員，教育國家機關的全体工作人員，教育全國人民。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嚴密各種制度，堵塞各種可以給反革命分子利用的漏洞，才能及時地發現反革命分子而加以肅清。這是我們肅清反革命分子的最重要的前提。

爲了肅清反革命分子，必須發動羣衆，使保衛治安的專門工作同羣衆鬥爭相結合。同反革命分子作鬥爭當然需要專門的工作，但是專門工作機關的人員究竟是有限的，他們不可能知道每一件事情，更不可能做到每一件事情。但是有了羣衆的合作，他們的地位和力量就完全不同了。大家知道，一九五一年的鎮壓反革命運動所以得到偉大的成績，主要地就是由於人民羣衆的力量。過去幾年中，許多反革命案件的破獲，也是羣衆協助的結果。羣衆在眼睛亮起來以後有很高的積極性和無限的智慧，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在這樣的羣衆中間就很難暗藏下去，因此他們最怕羣衆起來同他們鬥爭。最近各機關團體的工作人員學習了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三批材料，覺悟性和積極性大大提高了，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發現了不少的反革命分子。例如：對外貿易部查出了三個特務，其中一個特務王桐另外又發展了三個特務，並企圖建立反動武裝。地方工業部紡織局查出了一個反革命分子汪雨田，這個反革命分子不但窩藏了一個有血債的特務達六年之久，而且直到上月（六月）八日和二十五日，还把紡織局的全体工作人員一一加以評點，列了一個準備有朝一日逮捕問罪的“黑名單”！建築工程部的華北工程管理局財務處的羣衆，由於平日對該處的反革命嫌疑分子錢榮燦已經掌握了若干材料，

所以在一次小組會上就使他無法繼續隱藏自己的本來面目。

問：你爲甚麼說國民黨時代生活好？

答：我在長辛店鐵路上當會計主任，每月賺十袋洋麵。

問：你怎麼到的長辛店？

答：坐平漢路火車來的。

問：一九四五年平漢路火車不通你怎麼能來？

答：我是一九四六年八月來的。

問：你平日不是常說一九四五年在北京結的婚嗎？

答：……這個……這個……我要想一想……

就這樣，錢榮樑再也答不上來了。他只好招認他過去所說的履歷完全是捏造的，他原來是國民黨鐵道兵團的少校軍官。

很明顯，如果不是發動羣衆，這些黑暗的角落就不容易暴露，而反革命的細菌就會在裏面滋長活動起來，危害我們的國家機關和人民的安全。

我們从前面的實例看到，反革命分子是有空必鑽的，因此反對反革命分子的鬥爭必須在所有的組織中和全國人民中開展起來。有人說：我們的業務太忙，顧不上。問題是你顧不上整反革命，反革命分子可是顧得上來整你呀！又有人說：反革命分子在別處是有的，在我們這裏沒有。可是幾乎所有查出反革命分子的部門，原來也都以爲自己的部門是乾淨的呀！因此，爲了肅清反革命分子，特別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必須把羣衆普遍地無例外地發動起來。

爲了肅清反革命分子，必須堅持貫徹正確的政策。提高警惕性，發動羣衆，這些都是正確的政策。在這個基礎上，還必須嚴格劃清反革命分子的界限。毛主席給我們提出這樣兩句口號：“提高警惕，肅清一切特務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個好人。”這必須成爲全國公安機關以及全國人民在鎮壓反革命鬥爭